

养老保险、消费差异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邓大松 杨 晶

【摘 要】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中国居民养老保险、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并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三者之间的作用路径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养老保险对中国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消费差异损害了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2)养老保险能够缓解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消费差异既可以降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也可以通过生理健康剥夺和差异感知形成相对剥夺感,造成农村老年人心理上的悬殊差异而影响其幸福感。另一方面,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心理获得感和收入分配效应给农村老年人带来更高幸福感,进而缓解了消费差异的幸福“挤压”。(3)年龄大、已婚、初中及以上学历、健康状况好、金融资本多、获得过经济支持的农村老年人更幸福。

【关键词】农村老年人 幸福感 养老保险 消费差异 相对剥夺

【作 者】邓大松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教授;杨 晶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一、研究背景

农村老年人幸福感既是衡量中国农村居民幸福指数的标尺,也是乡村振兴和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内容。然而,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快速的人口老化及空巢老人比重持续攀升,挤压了家庭对“生养”资源的配置空间(穆光宗、茆长宝,2017),生存贫困和精神贫困的社会现象日渐凸显,迫切需要对农村老年人进行福利扶持。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居民物质财富的不断积累,“幸福感”作为“隐形的国民财富”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广泛关注。较多文献基于经济学视角测度了收入、财富、消费等经济变量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Clark 等,2008;Wang 等,2015),但国内外研究对“幸福—

*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扶贫战略研究”(项目编号:16JJD840007)的阶段性成果。

收入之谜”的观点褒贬不一。

近年来,基于相对剥夺假说的幸福效应分析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Hu(2013)分析了幸福与相对剥夺的关系,并认为公共部门就业能降低城镇劳动者的经济地位相对剥夺,进而间接提高其主观幸福感;Esping-Andersen等(2017)发现,在特定参照群组中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群体的相对剥夺感越强,其幸福感越低;马万超等(2018)认为,收入差距会产生相对剥夺,并通过心理路径导致较差的生理和精神健康,进而对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此外,幸福消费函数为幸福效应评估提供了重要视角(许玲丽等,2016),且消费差异比收入差异更能反映社会福利状况(孙豪等,2017),与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心理幸福感存在密切联系(Ganglmair-Wooliscroft,2019)。然而,基于相对剥夺视角的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有待深化。

幸福感程度除了受收入(或消费、财富)等经济的因素影响外,养老保险这一再分配机制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日益完备,其幸福效应日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如阳义南、章上峰(2016)认为,社会保险同幸福感显著正相关,没有养老保险的居民幸福感更低;张子豪和谭燕芝(2018)、李云峰和徐书林(2019)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但是,另一些学者对养老保险制度的幸福效应持消极态度,如孙良顺(2016)认为,农村养老金较低难以提升幸福感;Shin等(2018)发现公共养老金制度提高了居民寿命预期,但未对幸福感程度产生影响。此外,有学者发现,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对老年居民的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张川川等,2014;黄宏伟、胡浩钰,2018)。

综合来看,已有相关研究就养老保险对幸福感的影响进行了深入分析,但仍存在以下不足:(1)多数研究忽视了养老保险自选择问题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估计偏误,缺乏对中国新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幸福“促进”效应的实证检验。(2)受数据和指标等方面的限制,鲜有研究关注农村老年人个体层面的消费差异对其主观幸福感的剥夺效应尤其是养老保险是否对此产生了调节效应。并且,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机理仍有待进一步弥补和拓展。鉴于此,本文试图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5)数据和相对剥夺视角,探索中国居民养老保险、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

二、研究假设

根据幸福经济学的理论分析,老年人幸福程度这一主观福利结果不仅涉及老人自身,还涉及家庭经济状况和资源分配等重要因素。但在中国农村地区,家庭成员的活动往往围绕着老年人展开,农村老年人的生养资源供给问题是家庭内部资源分配各种矛盾的中心。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不同家庭在收入水平、人口负担、劳动力、生产生活需求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赵微、张宁宁,2019)。收入既是影响幸福感的传统因素,也是

消费的来源和基础,而大多数农村老年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随着家庭结构老化,收入分化下老年人会在消费行为上存在差异。部分研究证实了收入约束和消费水平对幸福感的影响(Zhang等,2015;鲁强,2018),但鲜有学者关注了个体层面的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及作用机理。此外,根据相对剥夺理论,与“他人”进行比较时,较低水平的个体往往处于劣势地位,容易使其对外界抱有消极的情绪(马万超等,2018),且这种相对劣势与自己的幸福感负相关(杨晶等,2019)。而农村老年人遭受越严重的消费剥夺,意味着个体面临的消费差异程度越深,更可能会形成相对剥夺感,并对农村老年人营养与健康造成影响,进而损害个人身心健康(黄云等,2019),间接影响老年人幸福感(胡洪曙、鲁元平,2012)。基于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消费差异程度越高,农村老年人幸福感越低,即消费差异通过影响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加剧主观上的差异感知,形成了“幸福剥夺”效应。

养老保险制度作为一项具有经济福利性的、社会化的民生工程,在培育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中具有重要作用。尤其是2014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全国范围内合并实施以来,覆盖9.1亿人的养老保险制度已经成为人民群众的社会安全网(郑秉文,2018)。近年来,中国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外流出,亲子间均衡的家庭保障代际关系被打破,传统的农村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弱化(曲延春、阎晓涵,2019),养老保险制度对生计脆弱性程度较深的农村老年群体发挥着更重要的收入再分配、缓解多维贫困的作用(解垚,2017)。同时,根据已有文献的分析,参保能够提高家庭当期消费(黄宏伟、胡浩钰,2018),缓解了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不公平感”,进而影响居民幸福感(岳经纶、张虎平,2018)。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2: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具有促进作用,即养老保险通过农民心理获得感和收入再分配效应,提高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假设3:养老保险能够调节消费差异,降低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剥夺”,进而增强主观幸福感。

三、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本文使用的数据为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 2015)数据,该数据由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组织调研,于2019年4月正式公布。调研范围覆盖全国东、中、西25个省份,问卷内容涵盖人口特征、受访者的主观态度、家庭投资、金融资产、负债和信贷约束、收入和支出、社会保障和保险等。从调查范围、调查方式和样本容量上看,CHFS数据具有较高的代表性,符合本研究旨在考察养老保险、消费差异与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关系的数据要求。由于研究对象为农村老年人,因此本文删除了城镇样本和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截取了60岁及以上的样本4610人。

(一) 模型设计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文基本回归方程设定为:

$$Happiness_i = \beta_0 + \beta_1 Pension_i + \beta_2 Inequality_i + \gamma CV_i + \mu_i \quad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Happiness_i$ 为农村老年人幸福感, $Pension_i$ 代表养老保险, $Inequality_i$ 代表消费差异指标(由 $Kakwani$ 消费相对剥夺指数来反映), β_1 、 β_2 表示养老保险、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协变量矩阵 CV_i 是其他控制变量的向量组, γ 代表协变量的影响,反映了个体特征、家庭特征控制变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 μ_i 为随机误差项。

被解释变量为农村老年人幸福感,CHFS 中问题为“总的来说,您现在觉得幸福吗?”。主观幸福感变量属于有序多分类离散变量,有从低到高的排序特征,直接选择普通线性回归有欠妥当,如果采用二元 Logistic 进行回归则可能造成数据信息丢失,因此,本文使用定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数据进行分析。此外,为了保证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在上式的基础上,将主观幸福感变量转换为二值变量用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以进行稳健性检验。

(二) 变量选取

本文将被解释变量 $Happiness_i$ 取值设定 5 种分类:非常不幸福 =1;比较不幸福 =2;说不上幸福不幸福 =3;比较幸福 =4;非常幸福 =5。核心解释变量从养老保险、消费差异两个层面选取指标进行考察。

1. 养老保险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中最重要社会安全网,在保障和改善老年人口福利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一般而言,参加了养老保险的农村老年人,获得了养老金转移性收入,故而心理幸福感可能越强。反之,其主观幸福感可能越低。本文选取是否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制度($Pension_i$)来考察其幸福效应,具体为:参加养老保险赋值为 1,未参加赋值为 0。

2. 消费差异

鉴于收入差距指标在衡量居民真实福利水平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邹红等,2013),本文采用由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测度的 $Kakwani$ 相对剥夺指数来刻画“消费差异”。根据 CHFS 数据,家庭消费用家庭所有成员的全年日常生活消费支出反映,包括生存型、发展型和消费型三大类型,涉及水、电、燃料、日用品费用及服务、食品、衣着、居住等满足较低层次衣食住行需要的生存型消费,通信网络、本地交通费、医疗保健支出和教育培训等发展型消费,以及用于休闲娱乐、旅游及某些精神文化用品与服务的享受型消费。本文讨论的“消费差异”测算为:令 Y 代表一个群组(参照的样本组),样本数量为 n ,对参照群内的农村老年人的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按升序排列,得到该参照群的总体消费分布为 $Y=(y_1, y_2, \dots, y_n)$,从而第 i 个农村老年人 y_i 受到消费相对剥夺 RD (即“消费差异”)可以表示为:

$$RD(y,y_i)=\frac{1}{n\mu_Y}\left[\sum_{j=i+1}^n(y_j-y_i)\right]=\gamma_{y_i}^+[(\mu_{y_i}^+-y_i)/\mu_Y]$$

(2)

式(2)中, μ_Y 为群组Y中所有样本的家庭人均消费均值, $\mu_{y_i}^+$ 为群组Y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超过 y_i 的样本家庭人均消费均值, $\gamma_{y_i}^+$ 为Y中样本家庭人均消费支出超过的样本数占总样本数量的百分比。

3. 其他控制变量

已有经验分析表明,农村老年人的个体特征及家庭资源禀赋及行为差异会导致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差异,因此,为了减少遗漏变量偏误,本文尽可能多地控制个体和家庭层面的变量。个体特征控制变量方面,年龄用受访者实际年龄表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健康水平、婚姻状况均为二分变量,男性、初中及以上、身体较差、在婚均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家庭特征控制变量方面,本文选取活期存款余额对数来反映金融资本状况,非家庭成员之间的经济支持和政府补助状况用二分变量表示,即获得经济支持、有政府补助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地区层面固定效应。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 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幸福感	3.65	0.91	1	5
参加养老保险	0.80	0.40	0	1
消费差异	0.50	0.21	0	0.98
年 龄	68.16	6.73	60	99
性 别	0.84	0.37	0	1
受教育程度	0.28	0.45	0	1
健康水平	0.33	0.47	0	1
婚姻状况	0.82	0.38	0	1
金融资本	2.96	4.17	0	13.59
政府补助	0.42	0.49	0	1
经济支持	0.28	0.45	0	1
地区变量	1.90	0.81	1	3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本回归结果

1. 养老保险的幸福促进效应

表2基准估计结果显示,在仅考虑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影响的情况下,与没有参加农村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相比,参与了农村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幸福感更高(见模型1),意味着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引入消费差异变量后(见模型3),养老保险的幸福效应依然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以政府财政为主导的养老保险制度是收入再分配的重要手段,通过养老金的转移性收入解除了农村老年人生活的后顾之忧,为维持农村老年人生活质量提供了基本保障。以上发现证实了养老保险制度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为新时代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2. 消费差异的幸福抑制效应

表2给出了基准模型估计结果,从表2模型2中消费差异结果可以看出,以个体相对

剥夺指数衡量的农村老年人消费差异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了负向影响,且该变量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具体而言,由 *kakwani* 相对剥夺指数测度的消费差异越大,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可能越低(OR 值^①= 0.7767)。从表 2 模型 3 可以看出,同时引入所有变量后,消费差异这一核心变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依然显著为负。可能的解释是,消费差异状况反映了农村老年人相对消费水平,当一个家庭遭受越严重的消费相对剥夺时,其消费差异程度更深,会损害农村老年人的幸福感。因此,该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 1。

3. 控制变量的异质性幸福效应

如表 2 模型 3 所示,控制变量中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水平对其主观幸福产生了较为显著的影响;家庭金融资本积累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有积极影响,与没有获得经济支持的老年人相比,获得过经济支持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更高,说明了个体特征和家庭禀赋是造成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异质性的主要原因。此外,性别变量和政府补助变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并不显著,意味着农村老年人对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而政府补助变量未能显著提高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可能原因在于,当前政府补助的低水平及可能存在的补助对象瞄准偏差。

(二) 对估计结果的进一步检验

本文稳健性结果显示:(1)将农村老年人幸福感转换 2 个等级来表示“幸福 =1,不

表 2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N=4610)

变 量	被解释变量:幸福感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参加养老保险(未参加)	1.1220*(0.0779)		1.1218*(0.0778)
消费差异		0.7767*(0.1015)	0.7769*(0.1015)
年龄	1.0185*** (0.0043)	1.0183*** (0.0043)	1.0190*** (0.0044)
性别(女)	1.0382(0.0863)	1.0357(0.0861)	1.0376(0.0863)
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	1.2770*** (0.0807)	1.2690*** (0.0803)	1.2691*** (0.0803)
婚姻状况(其他)	1.2875** (0.1039)	1.2846** (0.1037)	1.2863** (0.1038)
健康水平(身体较好)	0.5197*** (0.0313)	0.5190*** (0.0313)	0.5185*** (0.0312)
金融资本	1.0184** (0.0068)	1.0174** (0.0069)	1.0166** (0.0069)
经济支持(否)	1.1359** (0.0632)	1.1249** (0.0628)	1.1263** (0.0629)
政府补助(无)	0.9556(0.0599)	0.9465(0.0592)	0.9537(0.0598)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参数估计值以风险比(OR 值)的形式呈现。控制了地区变量。*、**、***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幸福 =0”,与整体性检验结果基本一致,养老保险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仍然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消费差异的作用效应依然为负。(2)使用稳健 OLS 估计模型佐证了养老保险、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3)养老保险自选择问题一

① OR 值表示解释变量每增加一单位引起的几率比 $p/(1-p)$ 的变化倍数。 $p/(1-p)$ 为事件发生比(陈强,2014:171)。模型 2 中消费差异的 OR 值为 0.7767(小于 1),意味着消费差异增加时,农村老年人幸福感提高的可能性降低,即幸福感与消费差异负相关。反之,OR 值大于 1 则意味着呈正相关。

直受学界诟病。理论上,养老保险制度参与决策是一个家庭在综合多方面因素考虑的结果,即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的农村老年人样本并非“随机”样本。一般而言,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经济社会特征会影响养老保险制度参与决策,同时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与家庭经济社会特征可能存在密切的关系。因此,实证模型中,是否参加养老保险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若采用传统的 OLS 回归方法可能会存在“自我选择”导致严重的内生性偏差。为此,本文以养老保险变量为政策变量,并使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养老保险的幸福效应进行估计与检验,以纠正以往模型未能有效解决的样本“自选择”问题。结果表明,经过倾向值匹配方法基本消除了处理组与控制组的可观测变量显性偏差后,一对一近邻匹配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0787,因此,养老保险确实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进一步对比稳健 OLS 估计结果可知,传统的线性估算方法可能低估了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正向影响,以上结果再次佐证了本文假设 2 的稳健性。

五、养老保险、消费差异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作用机制

(一) 养老保险对消费差异抑制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了更好地探讨消费差异和养老保险是单独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产生影响还是交互式地发生作用,在具体分析中,本文构建养老保险、消费差异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交互项($Pension_i \times Inequality_i$),以检验养老保险是否存在调节作用:

$$Happiness_i = \beta_0 + \beta_1 Pension_i + \beta_2 Inequality_i + \beta_3 Pension_i \times Inequality_i + \gamma CV_i + \mu_i \quad (3)$$

式(3)中,假设农村老年人幸福感 $Happiness_i$ 是关于养老保险、消费差异和控制变量的函数,变量交叉项的回归系数为 β_3 ,其他设定与式(1)相同。如果交互项 β_3 是异于零且在统计水平下显著,意味着消费差异和养老保险共同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表 3 模型 4 控制了个体层面(包括老年人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模型 5 控制了家庭层面控制变量(包括金融资本、经济支持、政府补助等),模型 6 引入了所有核心解释变量、交互项和控制变量。从养老保险和消费差异的交互项看,纳入调节效应后,养老保险的主效应虽然不显著,但模型中的交互项显著为正,这意味着调节效应是存在的。尽管加入了消费差异变量及交互项后,养老保险的影响效应不显著(存在多重共线性),但只要交互项参数估计值显著便可得出调节效应显著的基本结论。此外,为了减少非本质的共线性以改善对结果的解释,本文参考方杰等(2015)的做法,对连续型变量“消费差异”采用均值中心化进行处理,结果显示,交互项依然为正,且在 5%水平上显著。本文假设 3 得到验证。因此,本文认为,养老保险制度确实能够调节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抑制效应。为了佐证养老保险的调节效应,本文采用以下方法进行回归,并进行稳健性检验:(1)将农村老年人幸福感转换为二分变量(幸福=1;

表 3 养老保险对消费差异的幸福抑制效应调节作用(N=4610)

变 量	基准回归(定序 Logit)			稳健性检验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二元 Logit)	模型 8 (稳健 OLS)
参加养老保险	0.8241 (0.1427)	0.8342 (0.1448)	0.8003 (0.1390)	0.7950 (0.1542)	-0.0756 (0.0865)
消费差异	0.4402** (0.1247)	0.5228** (0.1481)	0.4545** (0.1293)	0.4323** (0.1356)	-0.3254** (0.1436)
交互项	1.8861** (0.5975)	1.6815* (0.5319)	1.9603** (0.6222)	2.0802** (0.7317)	0.2767* (0.1589)
年龄	1.0193*** (0.0043)		1.0194*** (0.0044)	1.0197*** (0.0049)	0.0089*** (0.0021)
性别	1.0400 (0.0862)		1.0407 (0.0866)	1.0089 (0.0934)	0.0235 (0.0410)
受教育程度	1.2732*** (0.0798)		1.2706*** (0.0804)	1.2230** (0.0885)	0.1237*** (0.0294)
婚姻状况	1.2965*** (0.1042)		1.2927*** (0.1044)	1.2491** (0.1121)	0.1256*** (0.0399)
健康水平	0.5146*** (0.0306)		0.5176*** (0.0312)	0.5705*** (0.0374)	-0.3422*** (0.0299)
金融资本		1.0274*** (0.0068)	1.0169** (0.0069)	1.0158** (0.0078)	0.0089*** (0.0031)
经济支持		1.1237** (0.0622)	1.1282** (0.0630)	1.12990* (0.0711)	0.0637** (0.0266)
政府补助		0.8957 (0.0554)	0.9519 (0.0597)	0.9147 (0.0639)	-0.0229 (0.0304)
Prob>chi2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注: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模型 4 至模型 7 以 OR 值形式表示,模型 8 为参数的回归系数值。模型 4、模型 5 没有控制地区变量,模型 6 至模型 8 控制了地区变量。*、**、***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量(心理获得感、收入分配效应)及消费差异渠道变量(生理健康剥夺、差异感知),分析其是否构成养老保险、消费差异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关系机制。

1. 养老保险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机制探讨

下面将着重探析养老保险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机制(心理获得感、收入分配效应)。本文中心理获得感用社会保障满意度来衡量,设置的问题为“您对目前社会保障的水平是否满意?”,按回答“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满意”和“非常不满意”分别赋值为 1~5(逆向指标);收入分配效应使用收入相对剥夺(通过 kakwani 指数和家庭人均收入计算得到)来衡量。根据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统计口径,家庭收入主要包括

不幸福 =0),并用二元 Logit 模型进行重新估计。结果显示,养老保险缓解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抑制作用依然得以证实(见表 3 模型7)。(2)进一步使用稳健 OLS 方法进行估计,结果显示,交互项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见表 3 模型 8),再次证实了养老保险在消费差异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中存在显著的调节作用。

(二) 养老保险、消费差异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传导机制分析

为进一步探讨消费差异、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机制,本文分别添加养老保险渠道变

工资收入、农业收入、工商业收入、财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检验中介效应常用的方法是逐步检验回归系数,即依次检验法。本文参考温忠麟、叶宝娟(2014)和马万超等(2018)的做法,使用多重中介效应依次检验方法进行中介机制分析^①。基本模型构建为:

$$Happiness_i = \theta_1 + c Pension_i + \gamma CV_i + \mu_i \tag{4}$$

$$M_i = \theta_2 + a Pension_i + \gamma CV_i + \mu_i \tag{5}$$

$$Happiness_i = \theta_3 + c' Pension_i + b M_i + \gamma CV_i + \mu_i \tag{6}$$

式(4)表示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的总效应;式(5)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心理获得感、收入分配效应)的影响;式(6)为加入中介变量后,养老保险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当式中待估系数 a、b、c 均显著时,意味着存在中介效应。若待估系数 c 显著,而 a、b 至少有一个不显著时,需要进一步检验系数乘积的显著性(即是否拒绝 0:ab=0),显著时存在中介效应。 $Pension_i$ 为核心解释变量养老保险(前面已经证实养老保险变量参数估计值 c 通过了显著性检验), M_i 为中介变量(心理获得感、收入分配效应),其他变量 CV_i 的解释同式(1)。

从表 4 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两个中介变量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此时核心解释变量不再显著,由此推断:心理获得感、收入分配效应是养老保险影响幸福感的中介变量。具体来看:(1)表 4 模型 9 证实了养老保险能够显著影响心理获得感中介变量,且模型 10 中控制了养老保险和心理获得感中介变量后,心理获得感中

介变量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在 1%的水平上也显著,即中介效应检验模型中的待估系数 a、b、c 均显著,可以初步判断中介效应成立。具体而

表 4 养老保险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机制					
变 量	模型 9 (心理获得感)	模型 10 (幸福感)	模型 11 (收入分配效应)	模型 12 (幸福感)	模型 13 (幸福感)
参加养老保险	-0.1275** (0.0538)	0.0729 (0.0520)	-0.0897*** (0.0097)	0.0599 (0.0532)	0.0414 (0.0525)
心理获得感		-0.2063*** (0.0230)			-0.2040*** (0.0229)
收入分配效应				-0.3939*** (0.1015)	-0.3603*** (0.0995)

注:括号内数据为稳健标准误。参数估计值以回归系数值的形式呈现。控制了其他变量。*、**、***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① 相对于简单中介效应模型而言,多重中介模型可以在控制其他中介变量(如控制 M1 心理获得感)的前提下,研究中介变量 M2(收入分配效应)的特定中介效应。这种做法可以减少简单中介模型因为忽略其他中介变量而导致的参数估计偏差。同时,通过对比心理获得感和收入分配效应的中介效应,可以判断哪一个中介变量的作用更强。另外,由于部分中介变量为分类变量,在后文的分析中,为对比各中介变量之间的大小,本文参考马万超等(2018)的做法,使用稳健 OLS 方法进行估计。事实上,Logiti 模型和稳健 OLS 模型所估计的符号和显著性没有差别。

言,受访者对当前社会保障水平越满意,即心理获得感越强,越容易带来精神方面的满足和缓解个人面临的生活后顾之忧,从而间接影响个体幸福感。(2)表4模型11估计结果表明,养老保险对收入分配效应中介变量产生了抑制效应,且通过了1%显著性水平检验,即养老保险会削弱个体遭受的收入相对剥夺,这揭示了养老保险收入再分配作用;模型12结果则表明,在控制了养老保险和中介变量(收入分配效应)后,以收入相对剥夺指数衡量的收入分配效应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显著为负,证实了养老保险会通过收入分配效应影响幸福感。此外,综合考虑情况下,通过中介效应系数初步判断得出,心理获得感、收入分配效应在养老保险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中都发挥了中介作用(见模型13)。上述结果某种程度上证实了养老保险可以通过提高农村老年人的心理获得感,以及降低收入相对剥夺程度来提升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从中介效应大小来看,心理获得感的中介作用较低(0.0260),收入分配效应的中介作用较高(0.0323)^①,因此,养老保险主要通过收入分配效应机制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产生影响。这些发现验证了假设2。

2. 消费差异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机制探讨

下面本文通过生理健康剥夺和差异感知这两个中介变量来探讨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剥夺机制。生理健康剥夺指标用“是否有慢性病”(是=1,否=2)来衡量。根据CHFS问卷,差异感知的测算问题为“您认为当今社会是否公平?”,按回答“非常公平”、“比较公平”、“一般”、“不太公平”和“非常不公平”分别赋值1~5(该变量为逆向指标)。本文依次检验方法对多重中介效应检验模型进行分析。模型构建为:

$$Happiness_i = \theta_1 + cInequality_i + \gamma CV_i + \mu_i \quad (7)$$

$$M_i = \theta_2 + aInequality_i + \gamma CV_i + \mu_i \quad (8)$$

$$Happiness_i = \theta_3 + c'Inequality_i + bM_i + \gamma CV_i + \mu_i \quad (9)$$

式(7)至式(9)中, a 、 b 、 c 、 c' 为回归系数。 $Inequality_i$ 为核心解释变量消费差异, M_i 为中介变量(生理健康剥夺、差异感知),其他变量 CV_i 的解释同式(1)。式(7)表示消费差异变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的总效应;式(8)表示核心解释变量对中介变量(生理健康剥夺、差异感知)的影响;式(9)为加入中介变量后,消费差异变量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的影响。

从表5简单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可以看出:(1)表5中模型14在农村老年人生理健康剥夺方程中,消费差异的影响系数显著为负,且模型12中生理健康剥夺、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负面影响显著,即待估系数 a 、 b 、 c 均显著,因此,可以初步判断生

① 结合式(5)和式(6)可以计算得到纳入所有中介变量后各个中介变量的中介效应(即参数估计值 b 与 a 的乘积)。其中,心理获得感的中介效应计算方法为: $(-0.1275) \times (-0.2040) = 0.0260$;收入分配效应的中介效应计算方法为: $(-0.0897) \times (-0.3603) = 0.0323$ 。

理健康剥夺是消费差异抑制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渠道。本文认为,在家庭养老弱化的背景下,个体面临消费差异程度越深,农村老年人更容易遭受消

费贫困风险,同时,家庭内部的生活照料水平可能更低,因此,消费差异可能通过损害农村老年人的生理健康降低其幸福感。(2)模型 16 中,消费差异对中介变量(差异感知)的影响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模型 17 中差异感知对幸福感的负面影响也显著,因此,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可以通过差异感知来实现,即由消费相对剥夺引致的差异感知亦是老年人主观幸福的重要影响机制。此外,综合考虑两个中介变量的情况下,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同样表明,生理健康剥夺和差异感知的中介效应依然成立(见模型 18)。从中介效应大小来看,差异感知的中介作用为 0.0479,其计算公式为: $(-0.3083) \times (-0.1554)$,生理健康剥夺的中介作用为 0.0171,计算公式为: $(-0.1152) \times (-0.1485)$,意味着差异感知的中介作用更强,因此,消费差异主要通过差异感知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产生抑制影响。以上结果再次证实了假设 1。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发现:(1)消费差异是中国农村老年人幸福感剥夺的重要因素,消费差异越大,农村老年人幸福感越低。而养老保险产生了显著的幸福促进效应,并且能够有效缓解消费差异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不利影响。(2)进一步检验发现,养老保险通过提高心理获得感和收入分配效应增强了农村老年人幸福感,而生理健康剥夺和差异感知是消费差异降低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机制。(3)年龄大、在婚、初中及以上学历、健康状况好、金融资本多、获得过经济支持,农村老年人幸福感越高,意味着家庭禀赋异质性特征对农村老年人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以上发现为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下政府部门培育农村老年人晚年幸福、降低不平衡不充分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

基于以上基本结论,本文得出以下政策启示:(1)健全与完善农村老年人社会保障机制。鉴于养老保险在培育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中具有重要作用,一方面,以提升老年人幸福感为导向进一步完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建设。国家财政应根据可能继续加大对参

表 5 消费差异影响农村老年人幸福感的中介机制

变 量	模型 14 (生理健康剥夺)	模型 15 (幸福感)	模型 16 (差异感知)	模型 17 (幸福感)	模型 18 (幸福感)
消费差异	-0.1152** (0.0456)	-0.0268 (0.0879)	-0.3083** (0.1129)	-0.0646 (0.0875)	-0.0807 (0.0870)
生理健康剥夺		-0.1597*** (0.0358)			-0.1485*** (0.0353)
差异感知				-0.1561*** (0.0169)	-0.1554*** (0.0169)

注:模型中未纳入健康水平指标,其他变量同表 2。括号中的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控制了其他变量。*、**、***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保缴费及养老金发放的补贴力度,适时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发放标准,增强农村老年人的实际获得感。另一方面,加强农村养老保障、精准扶贫与医疗保障政策之间的有序衔接、形成保障合力,相关福利政策也应向老年人群倾斜,同时,强化农村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建设,积极探索农村老年人“医养结合”和社区居家养老模式,更有效地满足其文化、娱乐、健康、养老等方面的生活需求,更好地保障农村老年人的生活质量,解除其生活后顾之忧。(2)在乡村振兴和精准扶贫背景下,需要重点防范农村老年群体消费差距拉大。通过行之有效的收入分配机制,不断完善惠农政策,进而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水平与消费能力,缩小农村家庭收入分配差距和消费差异,从整体上降低消费差距对农村老年人的幸福剥夺感。(3)结合现阶段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精准识别及帮扶生计脆弱性的农村老年人(未婚、丧偶、离异、受教育程度较低、身体健康较差、无经济支持和缺乏金融资本等),在大力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并着力改善其生活质量的同时,还需要关注老年人精神慰藉需求,从身体健康、生活照料和精神抚慰等方面对农村老年群体进行精准帮扶,提高老年群体的幸福感。此外,加强乡风文明建设和村社有效治理,以村(居)、社区为单元,建立农村社区老年人组织,通过邻里互助和经济支持,缓解其生活焦虑感,也是培育中国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抓手。

考虑到消费差异的形成还受限于老年人生活习惯、家庭生命历程的影响,本文基于特定参照组的消费相对剥夺视角研究主观幸福感问题可能存在局限。同时,中国养老保险制度也正经历着“渐进式”的改革,今后的研究应进一步将主客观指标进行协同,并使用更长期的面板数据进行时间效应和异质性效应全面分析。

参考文献:

1. 陈强编著(2014):《高级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
2. 方杰等(2015):《基于多元回归的调节效应分析》,《心理科学》,第3期。
3. 黄云等(2019):《收入不平等对农村居民身心健康的影响——基于 CGSS2015 数据的实证分析》,《农业技术经济》,第3期。
4. 黄宏伟、胡浩钰(2018):《“新农保”养老金制度与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效应——来自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经验证据》,《农业经济问题》,第5期。
5. 胡洪曙、鲁元平(2012):《收入不平等、健康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来自中国老龄化背景下的经验证据》,《中国软科学》,第11期。
6. 李云峰、徐书林(2019):《农村养老保障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分析》,《调研世界》,第3期。
7. 鲁强(2018):《生育行为与主观幸福感:货币路径、非货币路径与调节效应——兼论“幸福—收入”之谜》,《宏观质量研究》,第2期。
8. 穆光宗、茆长宝(2017):《人口少子化与老龄化关系探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第6期。
9. 马万超等(2018):《收入差距对幸福感的影响机制研究》,《经济学动态》,第11期。

10. 曲延春、阎晓涵(2019):《晚年何以幸福:农村空巢老人养老困境及其治理》,《理论探讨》,第2期。
11. 孙豪等(2017):《中国消费基尼系数估算及社会福利分析》,《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第12期。
12. 孙良顺(2016):《社会经济地位、社会保障、生态环境与城乡居民幸福感——基于CGSS(2013)数据的实证分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6期。
13. 温忠麟、叶宝娟(2014):《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和模型发展》,《心理科学进展》,第5期。
14. 解亚(2017):《养老金与老年人口多维贫困和不平等研究——基于非强制养老保险城乡比较的视角》,《中国人口科学》,第5期。
15. 许玲丽等(2016):《幸福,赚钱还是花钱?》,《财经研究》,第6期。
16. 阳义南、章上峰(2016):《收入不公平感、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金融研究》,第8期。
17. 杨晶等(2019):《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对失地农民个体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3期。
18. 岳经纶、张虎平(2018):《收入不平等感知、预期与幸福感——基于2017年广东省福利态度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公共行政评论》,第3期。
19. 张川川等(2014):《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政策效果评估——收入、贫困、消费、主观福利和劳动供给》,《经济学(季刊)》,第1期。
20. 张子豪、谭燕芝(2018):《社会保险与中国国民幸福感》,《金融经济研究》,第3期。
21. 邹红等(2013):《消费不平等的度量、出生组分解和形成机制——兼与收入不平等比较》,《经济学(季刊)》,第4期。
22. 赵微、张宁宇(2019):《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5期。
23. 郑秉文(2018):《中国社会保障40年:经验总结与改革取向》,《中国人口科学》,第4期。
24. Clark, A.E., Frijters, P., Shields, M.A. (2008), Relative Income, Happiness and Utility: an Explanation for the Easterlin Paradox and Other Puzzle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6(1):95-144.
25. Esping-Andersen, G., Nedoluzhko, L. (2017), Inequality Equilibria and Individual Well-being.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62(10):24-28.
26. Ganglmair-Wooliscroft, A., Wooliscroft, B. (2019), Well-being and Everyday Ethical Consumption.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0(1):141-163.
27. Hu, A. (2013),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Relative Deprivation and Happiness in Adult Urban Chinese Employees. *Health Promotion International*. 28(3):477-486.
28. Shin, I., Ercolano, S. (2018), Could Pension System Make Us Happier?. *Cogent Economics & Finance*. 6(1):1-26.
29. Wang, P., Pan, J., Luo, Z. (2015), The Impact of Income Inequality on Individual Happiness: Evidence from China.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121(2):413-435.
30. Zhang, J., Xiong, Y. (2015), Effects of Multifaceted Consumption on Happiness in Life: A Case Study in Japan Based on an Intergrated Approach.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62(2):143-162.

(责任编辑:朱 犁)